

## 晚明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探析

王 公 伟

(烟台师范学院政法系,山东烟台 264025)

**摘 要:**明代晚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其策略是不断变化的,最早传教士采取的是与佛教认同的策略,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于是改变策略,开始向儒家靠拢,并批判佛教。同时,传教士还以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工具传播基督教教义,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一定的进展,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几个传教的基地,并发展了一些信徒。

**关键词:**明代晚期;基督教传教;传教策略;利玛窦

**中图分类号:**B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1)04-0049-05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巨变。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传入中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因素。实际上,基督教并不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晚明以前,它曾经几次进入中国,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中国生根发芽。<sup>①</sup>明代晚期,基督教重新进入中国,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往基督教进入中国,欧洲和中国同处封建社会阶段。二者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程度的差别。但到了晚明,欧洲已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却还是处在封建社会,中国与欧洲二者之间的社会形态已经不同。同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传教士有了一个传教的利器——近代科学。晚明社会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是与其传教策略密切相关的。

基督教是由各种派系构成的,当时来华传教的教派很多,但最终以耶稣会的业绩最大。耶稣会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在1534年创立,6年后经由罗马教廷批准,很快遍布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波兰等国。耶稣会会员誓愿绝财、绝色、绝意,并绝对效忠教宗。耶稣会与以往的基督教教团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强调对教宗和会长的绝对服从,以及对于天主“纯正”的信仰。(二)耶稣会非常注重学术教育和海外布道活动。(三)耶稣会传教手段富于灵活性和宽容性。<sup>[1](P37)</sup>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耶稣会很快将其传教的范围扩展到亚洲。

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在明嘉靖年间进入日本传教,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对他说:“如果你们的宗教是真理,为什么作为一切智慧之源的中国人没听到它呢?”<sup>[2](P7-8)</sup>这

<sup>①</sup>如唐代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流行,元代有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的蒙古语音译)的传播。有关情况详见陈垣先生的著述。

收稿日期:2000-08-10

作者简介:王公伟(1966-),山东龙口人,烟台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就使沙勿略决心进入中国传教。嘉靖三十一年(1552),沙勿略进入中国广东海外的上川岛。由于当时实行海禁,他无法进入中国内地。沙勿略到中国传教的愿望虽然没能实现,但他寄回欧洲的书信,却极大地影响了耶稣会。于是耶稣会便将传教的目标指向了中国。万历七年(1579),受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之命,传教士罗明坚从印度进入中国的澳门,准备在中国传教。万历十年(1582),罗明坚进入广东的肇庆。从此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之路就开始了。

## 一、耶稣会传教策略的演变

罗明坚进入中国之后,便面临一个传教策略的选择问题。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从其源地向外扩张,无非有两种手段:一是和平的手段,二是利用实力强迫其他地域的人民接受其宗教。当时的中国虽然国力与以往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世界强国。那时的欧洲,虽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是还没有强大到19世纪初期那样的程度。同时,当时的中国社会由于饱受倭寇和海盗的骚扰,因此对任何外国人都有很高的警惕性。这样,耶稣会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采取和善的方式,首先取得中国人的信任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再结合耶稣会在日本传教的经验,传教士采取了与佛教协调的策略。在中国,最早开始这样做的是罗明坚。

传教士进入中国,首先面对的就是佛教。佛教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所以,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一关,就是如何与佛教协调的问题。罗明坚等人对中国社会根本不了解,但他们看到佛教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有类似之处,于是认为采取与佛教一样的装束会更有利于传播基督教。所以,罗明坚到肇庆之后,便欣然接受当地官员建议,将自己打扮成僧人的样子,居住在寺庙中,传教的方式也按照佛教的方式进行。如此一来,传教士被中国人看作是“西僧”,教皇也被称为“大僧”。范礼安是这样描述当时传教士的状况:“一、在官员面前他绝对不许坐下,整个觐见时间他必须跪着;二、他被怀疑为澳门葡萄牙人派来的奸细;三、他们的寓所被看作和尚庙,人人都可以随便进去,官员可以在里面设宴款待不受欢迎的宾客,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sup>[3](P120)</sup>这就是说,当时的传教士地位是比较低的,他们被看作是从西方来的僧人。因此,早期的传教士对佛教的认同,既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国的文化环境所迫。也就是说,在基督教问题上,国人存在着误读。对基督教的这种误读使得基督教在华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变小了。

罗明坚进入中国不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随而至。利玛窦应罗明坚的邀请进入中国的澳门,在那里,利玛窦学习了汉语和一些当地风俗习惯。与罗明坚一样,利玛窦刚到中国时,也是与中国的佛僧一样的装束。但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很快就发现僧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高,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受过儒家思想教育并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于是利玛窦与罗明坚在传教策略上产生了分歧。罗明坚认为佛教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最佳点,故应与佛教保持一致;利玛窦则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只有保持与儒家的一致才能更好地传播基督教。尤其是在南京的一次辩论,使利玛窦的这种认识更为明确了。1599年,利玛窦到达南京。他的好友瞿太素安排了一次与李汝楨的辩论,当时的工部主事刘斗墟也在场,在听完李汝楨的佛教主张之

后,刘斗墟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受的是孔门儒家的教育,居然有人反对孔子,信奉外来的佛教,实在是件可耻的事。”<sup>[4](P12)</sup>刘斗墟的这种态度使利玛窦对佛教在整个士大夫阶层中的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随着利玛窦等人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三教有了更明确的认识:“首先是儒教,即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的教派。孔子是极其卓越,洁身自好的伟人之一,……备受所有的弟子和信徒崇敬,以致他们在朔望之日群集于宫中学堂里,对他的肖像敬香叩头。……其次是释迦的教派,……僧人多少窥知来世,指导一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再次是道教。道士效法某一个人,认为他是个圣人,应受崇拜。”<sup>[3](P142-143)</sup>在三教之中,佛教的地位比较低:“僧人被视为中国社会最卑鄙最歹毒之人,出身寒微,一个个都来自最低贱最贫困的家庭;他们自幼即被父母卖给老和尚,被收养为继承人。……尽管不能娶妻,他们却是最放荡的人,只要竭尽全力悄悄干他们的坏事,以免受到官府严惩。……他们的庙宇分成若干僧舍,都指派了终身执事。……可以去租房间,……而每座庙不如说是像个大旅店……里面最无人过问的就是拜佛、念经、习佛法。”<sup>[3](P166)</sup>需要说明的是,利玛窦的这种说法不尽符合当时的佛教界状况。尽管晚明佛教界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有像株宏(莲池大师)那样戒行严格的高僧。利玛窦所理解的僧人是一些“伪僧”,即由于社会动乱,生活没有着落而临时混进僧界的人,他们的身份是不被政府和僧界承认的。

基于这种认识,利玛窦等人开始改变以前的传教策略,这种转变分两个层次:一是从装束上,利玛窦等人不再穿着和尚的僧衣,而是改穿中国士人的儒服。这一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它只是要从外表上改变人们的看法而已。二是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利玛窦等人看来,如果基督教不能在中国的士人阶层得到认同,那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无法实现,即使取得短暂的成功,最终也要失败。而要使中国的士人阶层消除对基督教的怀疑和排斥心理,就只有在思想上让儒家学者认同。

从那以后,利玛窦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儒家的传统经典《四书》等著作,并最终成为一名饱读经书的西方学者。在与士大夫的交往过程中,利玛窦时刻提醒人们他是一名崇拜儒家思想的西方人,于是“西儒”和“利进士”的称号不胫而走。同时,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也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并利用一切机会批判佛教:“我从早到晚交谈、议论、阐明我教信仰;经我们指出他们那个教的谬误之后,许多人想入基督教,痛斥偶像,要抛弃偶像。”<sup>[3](P224)</sup>

值得注意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分歧,仅仅是在传教策略上,至于他们对待佛教和儒家思想的真正态度则没有任何不同。基督教作为一种严格的一神教,对其它文化体系是一律排斥的,这就决定了它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态度。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所以传教士在中国不可能采取他们在美洲及其它经济和文化不发达地区的传教策略。他们要在中国立足,就要首先取得中国人的信任。因此,无论是罗明坚认同佛教的策略还是利玛窦对儒家的亲近,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国人对他们的排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利玛窦寄回欧洲的信件中明确看到:“虽然儒家拒绝谈论超自然真实,但在伦理教诲方面与我们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我一开始就利用这一教派来攻击其它两教(偶像教)而不驳斥儒教,而是把看来违反我教神圣信仰的那些章节加以解释。……我们要是以蓄意的言词武装自己。同时打击三教,那就会处于非常麻烦的境地;不过,我仍然不放弃

机会,现时的士大夫的某些新论,只要是不符合古训的,都予以驳斥。”<sup>[3](P225)</sup>

## 二、以“科学”为工具的传教方式

耶稣会进入中国之后,发现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异常的戒心,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打开中国之门。后来耶稣会成员发现,中国人对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新奇之物,比如自鸣钟、三棱镜等东西很感兴趣,于是就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吸引中国人,以图打开局面。正是依靠这些小玩意,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很快在广东得到了居留地。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利玛窦认识到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于是积极地向人们传授这一方面的知识。利玛窦说,他的中国朋友瞿太素“对那些新鲜事物十分喜爱,似乎从来不能履足,总是不断学习。先是学习算术,然后学习克拉韦乌斯神父的《地球论》,最后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第一册。于是在这些知识的装备下,瞿太素很快就学会了各式各样的日晷以记时辰,还能运用几何规则和尺度来测量高度和距离。他夜以继日背诵学到的知识,又亲手制作了各种木制、铜制、甚至银制的工具:六分仪、天球仪、测象仪、量角器和磁盒等”<sup>[3](P139)</sup>。通过瞿太素的例子,利玛窦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传教中的作用。当然,利玛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晚明的人们之所以对科学知识感兴趣是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当时人们认为科学技术与所谓的点石成金之术密切相关。<sup>①</sup>第二,人们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些新奇之物很感兴趣,故而对创造这些物品的科学技术也乐意接受。第三,晚明社会已开始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前夜,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就使得人们对科学技术有着急迫的需求。在以上三种情形的作用下,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有着异常的兴趣。传教士便因势利导,以此为工具传播基督教信仰。利玛窦常以许胥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许胥臣是明朝的一个官僚,他曾经对传教士王丰肃说,他根本不喜欢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王丰肃便做了一架浑天仪和一架地球仪给他,并赠送了一幅《堪舆万国全图》。许胥臣见了之后,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很赞赏。王丰肃趁机劝许胥臣入教,并对他说:“到目前为止,你所学的,与基督教的信德奥秘相比,那真是雕虫小技而已。膜拜天主往往超过观赏星辰。”<sup>[4](P530)</sup>于是许胥臣成为基督教徒。利玛窦曾经得意地说:“利用科学使中国学人入教,这是最好的例子。”<sup>[4](P530)</sup>

## 三、基督教在晚明社会的传播情况

利玛窦等耶稣会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比较有效的传教策略。耶稣会利用这一策略,成功地在华建立了几个传教据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1589年利玛窦离开肇庆到了韶州,并在西关谋得一居留地,并开始建造教堂。这是基督教在华第一个比较稳定的传教基地。1596年,利玛窦借为兵部侍郎石大人的儿子治病的机会,到了江西的南昌。南昌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读书风气很盛的城市,在全国的影响力也很大。这一点对于利玛窦等人所奉行的传教策略很有利。所以,南昌很快成为耶稣会在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南京是明代早期的首都,在当时的中国占有非常

<sup>①</sup> 利玛窦等人到中国之后,由于他们不像佛僧一样进行化缘,所以他们的经济来源一度被人们怀疑,进而人们认为他们有点石成金的特异本领。

重要的地位。能够在南京建立传教基地,是耶稣会尤其是利玛窦等人的理想。几经周折,利玛窦等人终于在南京取得了居留权,并建立了据点。基督教在南京的立足,使得它可以直接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交锋,这对于基督教日后在中国的发展很有利。北京一直是利玛窦念念不忘的地方,在利玛窦看来,只有依靠皇帝的支持和庇护,基督教才有可能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1601年,利玛窦等人到达北京。依靠自鸣钟等供物,利玛窦得以进宫,并“参拜龙座”。利玛窦以自己对儒家经典和欧洲科学的熟悉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泰西儒”。能够在北京立足,这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最大成功。一般而言,在整个明王朝,北京是不允许外国人定居的。但利玛窦靠个人的努力取得了居留权,这对于耶稣会的传教来说,不啻是有了尚方宝剑。事实上,利玛窦等人在北京的存在,确实起到了保护其他传教基地的作用。

耶稣会建立了传教基地之后,他们的传教活动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结识各地的权贵阶层,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条件。耶稣会每建立一个传教基地,其成员,尤其是利玛窦,便积极活动,与当地的官员建立关系,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韶州,利玛窦在瞿太素的协助下,结识了许多有势力的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去拜访过利玛窦,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在此期间,利玛窦先后结识了英德知县苏太温和南雄知县王应麟以及日后对他有重大作用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在南昌,利玛窦先后拜见了显宦、皇室、名流以及大儒,并与在南昌的建安王、乐安王、弋阳王常有来往。在南京期间,利玛窦充分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扩大自己的声望,以利于将来进京觐见皇帝。这一时期,南京国公、五军提督、太监头目等都来邀请利玛窦;利玛窦也通过各种关系结识了叶向高、厉汝进等大儒。在北京,利玛窦除了与当时的官僚保持密切的关系外,还积极在士人阶层中寻找保护人,建立了一个护教的组织。利玛窦在北京期间,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关系密切,他们先后受洗,日后成为晚明基督教的三大柱石。<sup>①</sup>

第二,刻印书籍,传播基督教思想。在利玛窦等人看来,中国人对于书本特别感兴趣。同时,由于中国的幅员广大,传教士不可能到达所有的地方,而书本则可以到达。因此,在中国的传教士就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刻印书籍,来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早在南昌基地,利玛窦就写了一本《交友论》的书籍,其中借着介绍西方哲人关于交友的思想来传播基督教思想。在南京和北京,利玛窦先后刊印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箴言》等传播基督教思想、批驳佛教理论的书籍。

第三,吸收信徒。通过建立传教基地和传播基督教思想,为吸收信徒创造了条件。据利玛窦自己所写的信所说,在肇庆时,“我们的(教徒)羊群数量已经增加,簿记快满四十名了,有经验的人都说这个数字不小。”<sup>[3](P109)</sup>在韶州,1591年,一个叫做郭嵩华的商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利玛窦为他起教名为“约瑟”。以后陆续有十几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sup>[3](P150-151)</sup>至于在南京、北京受洗的人就更多了。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是很有成效的。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基督教不断扩张,最终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一带得到了发展。日后,这一地区也成为基督教

<sup>①</sup> 徐光启是1603年在南京由罗如望洗礼,李之藻是1610年在北京由利玛窦洗礼,而杨廷筠确实在1610年从金尼阁等人洗礼,此时利玛窦虽已去世,但在生前即与杨廷筠交往密切。

与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交锋的前沿。

#### 参考文献:

- [1]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孙尚扬.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 [3]裴化行. 利玛窦神父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4]利玛窦. 利玛窦全集;第二册[M].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光启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

(责任编辑 董剑平)

(上接第36页)

说明教育的发展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必需,而且也与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有密切的关系。

但在我们承认教育救国思想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应否认教育救国思想中的根本弊端。如吴稚晖即有革命一起,易生革命党之暴徒,始则夺权于少数强权者之手,继则互相争夺,肆为屠戮的疑虑。如若无视中国问题的本质所在,把教育视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方法,甚至以此贬低和抵制革命斗争,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结合实行反动统治的结果,解救中华民族的任务,单靠教育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不彻底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受列强任意宰割凌辱的命运,教育也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教育救国的服膺者情况复杂,难以一言道明。他们或不甘于民族国家之任人凌辱,或震慑于暴力革命的急风骤雨而选择了这一主张,也因每个人地位的不同、认识的差异、觉悟的高低而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方向。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在事实面前逐渐放弃单纯依靠教育的幻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为真正的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有一部分人虽未加入革命阵营,却始终没有放弃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以独立思考、埋头苦干的精神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发展,虽不免与革命的主旋律有不协调之处,却也对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对民族的复兴起到了一些有益的作用。可悲的是,吴稚晖与上述两种情况均有所不同,他既没有参加革命,也未能守住一个知识分子该有的良心,反而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膨胀了其思想中的政治实用性倾向,最后沦为国民党蒋介石忠心不二的走狗,成为鼓吹“教育救国”分子中最为堕落的人物。

#### 参考文献:

- [1]吴稚晖传记资料:(一)[M]. 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
- [2]吴稚晖. 吴稚晖学术论著[A]. 上海通社. 民国丛书;第85卷[M]. 上海:上海书店,1927.
- [3]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20卷[M]. 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76.
- [4]吴稚晖. 青年与工具[J]. 新青年,第2卷2号(1916-01-01).

(责任编辑 郑军)